

苏东坡寓言评注

朱自清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赖云琪
封面设计 江 东
技术设计 晓 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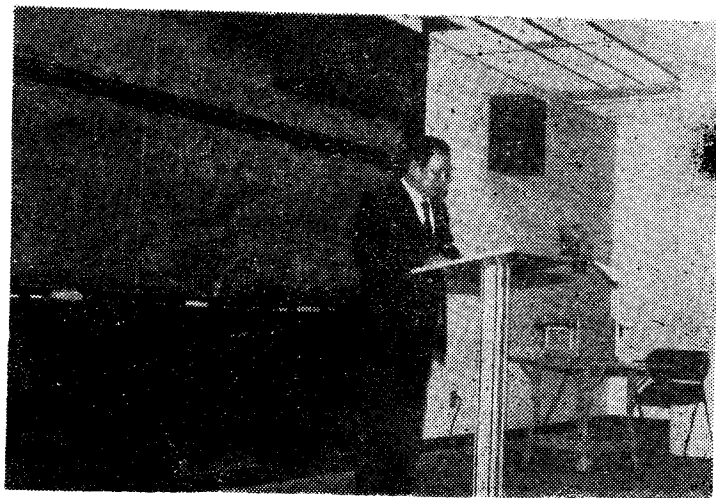
朱 靖 华 编 著
苏东坡寓言评注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插页3 字数165千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0850-0/I·171

定价：2.05元



本书作者于1988年2月18日晚,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亚洲研究学会讲演
苏东坡的诗词和寓言。

作者小传

朱靖华，男，1928年4月27日生于山东省安邱县，1950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教，在外文局《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社任编辑，1961年春调中国人民大学，现任该校语言文学系教授、唐宋文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术界，担任了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艺学会理事、北京市《水浒》研究会理事、全国理工院校文科教材丛书副主编、北京教授讲学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四十年代末，作者读大学期间，即在导师冯沅君教授指导下攻读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发表了学术论文。五十年代初，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寓言、小品及文学评论等作品，同时开始整理、著述中国古代寓言的工作。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解放后的第一部古代寓言评注集《先秦寓言选释》，受到读者与学术界的注目和欢迎。1983年起，又与公木合作，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历代寓言选》上、下册。自六十年代起，作者着重研究苏轼及其文学创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之多，并于1983年出版了专著《苏轼新论》（齐鲁书社），受到学术界的好评；1988年1月又在齐鲁书

社出版了《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与李永祜主编）。在此期间，另有《苏诗六论》（与王洪合著）、《古代寓言精华》（与管士光合编）、《历代书信选》（与麻守中合编）、《史记名篇赏析》（与顾建华、马志杰等合著）等著作，也将由有关出版社出版。

由于作者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产生了国际影响，1988年春，受到美国有关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先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亚洲研究学会、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学系、华盛顿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及西华盛顿大学外语系讲演苏东坡诗词及其寓言研究、中国古代寓言的特征、中国古典美学虚实论研究等专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讲学期间，美国佛罗里达《火炬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亚洲学会报以及西雅图《华声报》，都分别在头版发表了有关作者的采访记和照片。

前 言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全能作家，他的寓言也是杰出的。从我国寓言发展史来看，东坡寓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集大成性质和特点的艺术珍品。

苏东坡，即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轼自幼好学，才气横溢，“奋厉有当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二十二岁时中进士，受到主司欧阳修的赞赏，名满京师。他有振兴宋室、改变“积贫积弱”形势和“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策略一》）的政治要求。但因与王安石变法的政见不合，而被迫出京“补外”。后又被新法派投机分子罗织罪名制造了“乌台诗案”文字冤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公元1086年“元祐更化”，东坡被召入京，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侍读等要职；但又因反对宰相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又被排挤在外。宋哲宗亲政后，新法派专事派性报复，东坡竟被远贬岭南惠州及海南儋州。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遇赦北归，次年途至常州病逝，卒谥文忠。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及寓言专集《艾子杂

说》等。东坡历来主张文艺要“有为而作”（《晁绎先生诗集后》）、“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轼《东坡先生墓志铭》），因此，作为战斗匕首和投枪作用的寓言，便成为他纯熟运用的精神武器了。

中国古代寓言，早在先秦战国“纵横捭阖”、诸子盛起的时代，就曾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争鸣论辩的工具，放出了智慧的异彩。只不过它当时还仅是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还处于不自觉的艺术加工阶段。寓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样式，即文学作家有意识地进行寓言文学创作的，始自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柳宗元，他的突出贡献，是把先秦寓言从打比方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创作了大量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迥异于先秦散文；他并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润色功能，绘形绘色，自为畛域，造成寓言文学史的划时代的创造和发展。

苏东坡作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他在上述寓言创作发展的现状下，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他除了自觉继承柳宗元的创作独立寓言的优秀传统外，（如他学习柳宗元《三戒》而作《二说》），还在北宋激烈的政治、现实斗争的需求中，重新恢复了先秦寓言穿插在散文中当作讽喻政治、阐理论道工具的战斗传统。他使两种寓言形式并行不悖、相互映辉，相互发展，使寓言文学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艺术生命力。与此同时，东坡作为一位文学大师，他还使寓言在其“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中倍加渲染了文采华茂、赏心悦目的艺术技巧，使其寓言呈现出或独立、或穿插，或采取寓言手法、或使用浪漫幻想，或改造历史传说，

或拟人想象，灵活多样，绚烂多姿，形成丰富多采、不拘一格的艺术集大成的风貌，而成为寓言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一、东坡独立成篇的寓言

苏东坡不仅把柳宗元的自觉寓言文学样式的成果加以继承，还在思想内容上、艺术表现上加以深化，并大大推进了这种寓言体制的发展。

譬如《日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一则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它的主旨，是强调生活实践对于人类认识的重要作用的，具有社会生活复杂化后人类认识鉴别能力提高和加深的新时代特色，它实现了北宋时期较高水平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有如文中对“道”的解释，便有了新的突破。中唐自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来，对“道”一直存在着狭隘、片面的理解。古文家们一般把“道”局限在儒家六经之道的狭小天地之中。柳宗元虽讲“旁推交通”、“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除儒道，还好佛。但他最终，仍强调要“取道之原”（指《书》、《诗》、《易》、《礼》、《春秋》）。事实上，儒道是不能全面反映、概括和认识现实的复杂性的，至苏轼，才从实践中得知“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答王庠书》），他第一次在北宋历史上提出了“道”是生活规律的见解，这不仅远超先秦，也跨越了柳宗元，此其一。其二，在艺术方法上，它又显出比前人有长足进步的标志：寓言除了具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它还运用了“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

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性观念更趋深入和加强的方法。这在柳宗元的寓言中是难以见到的。在先秦寓言里，曾出现过类似“博喻”式的寓言，可能会对东坡发生影响，即它为述说同一个道理，接连运用两个以上的同类寓言故事，以增强其论旨的说服力。如《庄子》为表达其虚无的避世思想，曾在《人间世》中一连采用了《栎社树》和《不材之木》两则相类的寓言故事加以对照渲染，形容“大木”之所以能够存活和长寿，就是由于它们“无所可用”和“不材”之故，从而形象地强调说明了百无一用的废物（甚而对人类有害）才能苟全生命的道理。其它，再如《韩非子》的“连珠”式寓言群（先列其论说之目，而后排列一批内容相近的寓言加以实证）、《吕氏春秋》的“联合”式比喻（把几个相类的比喻组合在一起夹叙夹议，论证某一道理，如《察今》篇属此）等，也都大同小异。这类博喻式或连珠式寓言方式，目的只在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和实证力，在寓言与寓言之间缺乏情节发展上的内在有机联系，因而从中除掉一个，对其主旨的表达并无太大影响；而苏东坡的“螺旋式”，则是由几个寓意内部紧密联系而又互相补充、互为作用的寓言组成有机发展关系，除掉任何一个都不能完整地表现出寓言的全部含义，这便是东坡寓言的崭新创造和发展。《日喻》就是由“眇者识日”和“北人学没”这两则寓言组成螺旋的。前一则，通过“眇者扣盘扞烛”以为日的故事，说明如果对生活没有亲身目睹的切实观察和体验，“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则只能谬种流传，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来。如果寓言只写到此处为止，则只能说明“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的“求道之过”；而东坡写此寓言的落脚点却在

强调“学以致其道”的原理，因而仅用“眇者识日”的故事尚难尽言。为使其寓言的主旨逐步深化发展，东坡便又在“眇者识日”的基础上，以“然则道卒不可求欤”的问语诱导下，过渡到第二则“北人学没”的寓言，从而进一步强调出人们不仅要直接去接触生活实际，还要亲自去直接体验生活实际、学习生活实际，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才能真正“致其道”。这便使其寓言完整地阐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明代杨升庵曾评《日喻》说，“长公皆根极道理，确非漫然下笔。”陆贞山更说，“此明学道也。起语设问曰者说明道不可过求；后设学没水一段话，明道不可不学，有据之论。”（见嘉乐斋选评注《三苏文范》引）均说明东坡运用两则螺旋式寓言阐述事理，是有其缜密的构思苦心在其中的。

《威无所施》（《书孟德传后》），也是独立成篇、采用螺旋式表现手法的寓言。前者用“小儿戏沙”寓言，写二小儿不知惧虎，“戏沙上自若”的故事，说明虎因“威无所从施”而“卒去”的自然道理；后者再用“醉人击虎”的传说故事，进一步阐明“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的必然事理。二者分工说明了两个方面的不同情况：前者是小儿的、无意的、被动的；后者是成人的、有意的、主动的。这样，作者便全面的、左右逢源地渲染了“虎畏不惧己者”的完整理论，从而以虎作喻，鼓励了当时忠臣义士须不畏惧当权者（应指变法派）的“虎狼”权势、而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诚如《三苏文范》眉批所云：“下面实有数事作证，必先云尔，方见步骤。”这个“步骤”，就正体现出东坡运用“螺旋式”寓言方式的构思特征。

东坡独立成篇的寓言，还善于以他亲身经历的生活小故事用作比喻、阐发哲理，这又是东坡寓言的一大特点，这些篇什给人以清丽、亲切、宛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可得以使其题旨有如潜入五脏六腑，起到倍加移情益智的艺术作用。如《黠鼠》（《黠鼠赋》）寓言，描写了一只装在袋中装死、覆出乃逃的老鼠，整个故事，质朴生动、栩栩传神，像童子之惊讶、老鼠之狡黠，如画如见，恍然可即。但是，东坡把它当作一则寓言，并没有停留在描述故事形象的本身，而是通过生活感受，把它升华到理论高度。他指出，为什么“有生莫智于人”，竟“堕此虫之计中”？东坡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他“坐而假寐，私念其故”，从老鼠的狡黠脱身，悟到一种深刻的道理：“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即他认为，人们对生活事物必须要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思索，才能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理；如果“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即如果不能专心一致，而仅是从事物的表面现象观察问题，那怕是天赋聪颖的人，也将被老鼠的狡黠小计所欺骗。东坡作为一个诗人，他还在其生活感受的小故事中，习惯于把浓郁的抒情与精辟的见解结合起来，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黠鼠》的深刻含义可说是在诗意的体格里深藏，它的情理与诗的素质的统一，使寓言具有一种朴素、内涵的诗意美。诚如《庄子·山木篇》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除了《黠鼠》，再如《记游松风亭》、《方轨八达之路》等，也都属于这种雕琢和朴素相统一的优秀之作。

在东坡独立成篇的寓言中，不仅有发自我身边的生活故事，还有把自我形象干脆纳入诡奇虚构情节的寓言，在这方

面也是柳宗元等前人所尚未履及者。突出的如《子瞻患赤眼》、《别石塔》等是。《子瞻患赤眼》用笔奇特，他竟把自己的口、眼拟人化，让它们与自己争辩对话，从而生动地讽喻了自身内部为图私利闹不团结必然导致整体毁灭的结局的警人题旨。《别石塔》，则更诡奇地把无生物石塔拟人化，让石塔起立给东坡送别对话，从而巧妙地揭示出精深的寓旨。“（塔）若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这便犀利地讽刺了世上那些专事钻营拍马、图谋私利的小人的丑恶本性。从艺术上看，东坡首先打破了“动物拟人化”的寓言常规，他把无生物乃至世界万物都用作拟人对象，显得更加灵活自如、用笔挥洒，拓宽了寓言题材的创作面。其次，东坡在这类寓言中，之所以通过诡奇虚构的情节，意在赋予他思想观念以生活的形象，体现了“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伦〕陀罗雪维支《寓言的寓言》序）和“从一般中寻取个别”（歌德《箴言和回忆》）的特殊创作规律——“把思想穿上衣裳，赋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从而说明寓言不是偏重描绘生活本身，而是旨在表达思想见解，以弦外之音寄托教训。因而此类寓言，总是在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中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魅力。正如《三苏文范》引叶水心所说：“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皆如其所欲推出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柳宗元的独立成篇的寓言，由于开初是有意识地运用文学手段，故其寓言大多描绘精微，情节委婉跌宕，篇幅一般较长（多数百言者）。最短者如《大鯨》、《哀溺文》等也在一二百字以上。而东坡的独立成篇的寓言，则既有长篇，也有短制，而其短制的寓言，往往仅有三、四十字或五、六十字，

其设想之奇、用意之妙、艺术之精，常为他人履齿所不到。如《措大吃饭》，以五十余字，描写了两个心无大志、迂腐透顶的穷酸秀才形象；他们两人的“志向”不过是“吃饱了便睡”，或是“吃了又吃”。语言简洁机警，个性鲜明活脱，活画出宋时一班缺乏济世救民、满脑自私享乐的寄生虫的腐儒形象。再如《艾子杂说》中的《木屐》，仅用了三十四字，却极尽能事地表述出一个刻削木屐的能手。都能令人沉思深省、顿发妙悟。其它数十字的短制如《傍人门户》、《瓮算》、《苜蓿》、《二嫗让路》、《钻火》、《百钱独载》、《赶兔失獐》、《诛有尾》等，都是东坡的佳作精品。

由上可见，东坡独立成篇的寓言，除了充分继承了柳宗元等作家所开拓的优秀传统外，并进行了思想、艺术等多方面的创造性发展，使他的寓言不仅量多而且质优呈现出豪放洒脱、雄辩滔滔、腾挪跌宕、摇曳多姿的绚烂面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东坡穿插性寓言

东坡的穿插性寓言，主要散见在他的策论、杂著、书信和记述散文之中。穿插性寓言，是先秦诸子散文传统中所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目的在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等用作比喻，作为说理论道的工具，以使其文章具有无比的雄辩力和说服力，借以说动人主、教化习俗，讽谕世态，起到寄托教训、移情益智、劝戒警世的作用。东坡承接了这个有效的精神武器。

东坡为什么当柳宗元等把寓言提高到独立文体的地位并使之放出奇光异彩之际，又重新恢复了先秦穿插性寓言的作法？这是复古倒退吗？当然不是。是否定柳宗元的成就吗？也绝对不是，因东坡同样创作了大量独立成篇的寓言，并使之发扬光大，可见他是十分珍惜寓言的独立性发展成果的。东坡之所以要重新在散文中使用穿插打比方的方法，是出自他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理性化特点所决定的。东坡曾说：“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乞郡札子》）可见，当东坡的政治改革主张未被皇帝采纳，为了寻机施展其治国安民的才能，他便在诗文中使用了“寓物托讽”的艺术手段，企图“感悟圣意”、取得信用。于是，东坡的散文，特别是在政论、议论文中便大量使用起穿插性寓言来了，其数量之多，几乎是俯拾皆是。

再者，北宋时期，是一个充满论辩性的时代。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唐代已达到顶峰，而至宋代已开始走下坡路。如何挽救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命运，就成为当时一切政治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巩固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封建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都纷纷出来为其阶级编制新的统治理论，或者表现为革新政治的见解，或者发展为“二程”的理学主张，或者把儒、释、道合流，增强宗教的愚民统治等等。在论辩浪潮联翩而至的时代里，东坡作为一个“敢以微躯”“许国”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决不甘寂寞，便在论辩斗争中呈献出了自己的才华。更何况东坡所处的北宋中后期，又是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论战时期，如何摆脱表面承平、内里“积贫积弱”的“不测之

忧”，俾使宋廷“长治久安”，这使东坡毅然与自己的论敌变法派展开了激烈的、乃至终身的论辩斗争。他的许多奏议、策论以及议论性散文都是环绕着这个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大目标而写成的；为了增强他议论文的说服力，作为论辩说理工具的寓言，便很自然地被他多方面地调动和运用起来了。

另外，先秦穿插性寓言还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开门见山、论说明快、简洁犀利、一针见血，这要比独立成篇的寓言——一个故事讲一个道理，且需仔细揣摩品味才能获取内中深意的形式。更适宜于短兵相接的论辩斗争，这也是促成东坡广泛运用穿插性寓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东坡穿插性寓言，以之与先秦寓言相较，除了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政治性、犀利性、讽谕性诸特点之外，他还突出了自己的开拓性特点。

首先，东坡发展了先秦政治寓言的论辩性地位，有些寓言在文中常常构成为立论的根据和主体，这便区别于先秦寓言的依附性质。譬如《思治论》中的《富人营宫室》寓言，可作为这方面情况的代表。《思治论》全文的主旨，在于反复论述治理天下必须“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的道理；而《富人营宫室》寓言的内容，正是形象地强调了营建宫室的实际条件与可能，“先立规模，以见成效”。东坡在论文中首先举出这则寓言以总揽大纲，而后再配以种种史实故事加以烘托验证，夹叙夹议之，形成整篇论文的形象与议论相辅相成，甚至水乳交融般汇为一体的格式。因而这则寓言在论文中的地位是突出的，它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构成为东坡立论的灵魂和开道的先锋。

其次，东坡穿插性寓言更加强了它的匕首般的犀利作用。先秦诸子寓言的作者们，在向人主游说政治时，虽然也富有针对性、犀利性、以鲜明形象增强其论辩力，但因为是游说之士，面对的或是暴君或是诸侯，他们往往察颜观色、揆情度理，十分巧妙地运用着寓言譬喻以说动人主。即如有高强论辩才能、气势磅礴、锋芒毕露的“好辩”、“善譬”的孟子，他面对着残暴成性的梁惠王，并不敢直言不讳，而多是采取拐弯抹角、引人入彀的方法。即他故意不从正面直接否定对方，而是有意地避开话题，先从侧面利用寓言作比喻，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和思索，然后顺势导入预伏的圈套，不失时机地突然点明主旨，出人意外，而又恰到好处，最后迫使对方哑口无言，只得折服。如《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等寓言的创作即是如此。《韩非子》有所谓《说难》之论，也就是针对着上述情况和局面所发出的典型慨叹。东坡平生受《孟子》和《战国策》的影响颇深，但他却在新的时代要求和激烈的变法论争中，充分地发展了它们的泼辣直率、纵横恣肆、至大至刚、痛快淋漓的一面，使寓言的匕首、投枪般作用更为直接突出，时时呈现出短兵相接的景况。譬如《世有好剑者》寓言，便是直接针对着变法派的大轰大嗡、求治过速的的弊害而创作出来的，它以夸张的情节、骇人的结尾，雄辩地论证了空有好心而盲目行事者的可悲下场。东坡在寓言中实际是把朝中的变法派比作吹嘘“吾剑天下莫敌也”的“好剑者”的形象，他们只知把变法吹得天花乱坠，但却浮而不实；其所铸之剑虽是“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后成者”者，但由于“知铸而不知收”（指内部没有熔为有机的统一体），结果是“剑成而狼戾（散

乱)，缺折不可用”——完全是废铁一块。这则寓言对变法派的主观盲动、急功好利的讽刺，可谓极其犀利而尖刻，大有短兵相接的气势。再如谏用兵的《毁齿杀儿》寓言，也颇令人怵目惊心：

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

这则寓言比喻真切、生动，实证性强。小儿脱齿是人所必经者，故易诱发人们的亲身体验。从这则论辩性寓言可以窥见东坡咄咄逼人的气势。

再次，东坡的穿插性寓言，还增强了先秦寓言的诙谐性和幽默性，创作了大量笑话式寓言，从而促成了明清调谑、笑话寓言的飞速发展。东坡素以诙谐和幽默著称于世，他尝自谓：“余平生好……剧谈大噱。”（《跋文与可论草书后》）又自评文曰：“虽嬉笑怒骂文辞，皆可书而诵之。”——东坡对人生的超然大度和他旷达乐观的性格，决定了他充满诙谐、幽默的个性。即使当他身遭大祸、生死未卜的危难境遇中，他也往往能以戏谑姿态处之。譬如穿插在一则“信笔自书”中的《方轨八达之路》寓言：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